

美国汉学家浦安迪： 让西方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价值

□ 刘 林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浦安迪是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代表作有《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国叙事学》《〈红楼梦〉原型与寓意》等。浦安迪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始终秉持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相较于那些习惯性将中国文学边缘化的西方研究者，他采取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和中西互释、古今融通的方法，对中国古代小说给予许多客观、积极的评价，让西方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价值和地位。

塑造众多“组合形象”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标志性成就

浦安迪笔下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成熟过程，涉及结构模式、形象塑造、叙事节奏、文白混用、反讽意蕴、修辞手法等方面。仅就形象塑造来说，他认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标志性成就在于塑造出一系列“组合形象”或“组合性格”。

在浦安迪看来，“组合”一词大致有两种含义：一为“复合”，一为“集合”。所谓“复合”，是指小说人物在具有一种主导性品质的同时，也不乏其他非主导性的特征。如《水浒传》主人公宋江大体上具备英雄好汉的本色，但也时常出于个人野心和权欲而淡忘江湖义气。所谓“集合”，是指古代小说往往塑造出由多个人物组成的集体形象，最典型的是《三国演义》“桃园结义”故事中的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西游记》中的五位取经者等。《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刘备孙权三人都是乱世英雄，都善于因时因势而为，在政局动荡中建功立业，但曹操身上更多的是权谋、利益算计之类的阴暗面，刘备身上则多了忠于汉室、崇尚兄弟义气等正面品质，而孙权出于守护父兄基业的心态，多了几分不思进

取的保守气质，这就把这三人性性格区分开来了。由此看来，生活在这些集体形象中的人物彼此映衬、相互对照，最终百花争妍、各有千秋。

“组合形象”的丰富性和集体性，确保中国古代小说人物既不是某种抽象道德品质的代言人，也不是单打独斗的个人形象，而是一个个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的文学形象。虽然他们身上还存在着性格发展不足等缺陷，但瑕不掩瑜，浦安迪谈道，“无论这些16世纪中国作品是否应该称作‘novel’，我认为至少可以阐明，它们确实具备了被认为小说所应该具有的文学作用，或更确切地说，它们经得起欧美小说研究论著中的各种文学分析”。

中国古代小说具有独特的结构和文化寓意

伟大作品虽然都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但往往带给读者超越时空的审美体验，是理解和探讨特定文化传统的捷径。浦安迪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既是文学精品，也是文化结晶，阅读中国小说是了解中国文化的有趣途径。

浦安迪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质在于阴阳二元论和五行循环宇宙学，它们是从“肉身所感的时间性维度”向“智识所感的非时间性结构”的升华，为中国人思考“存在及其变化”提供了一种“持久的形式”“整体性视野”。以此为基础，中国古代小说才会出现那些屡见不鲜的二元范畴：动与静、合与分、兴与衰、荣与辱……“这些轴线的不停交替，构成了包含着小说缜密结构的重叠叙述网络”。

基于此，浦安迪指出，尽管中国古代小说并不具备亚里士多德《诗学》“头—身—尾”的三段结构，但这并不等于中国古代小说就没有“结构统一性”。他将“二元互补”“循环往复”视作中国古代小说独有的结构，如《三国演义》以“合”“分”为两大

对立互补元素，呈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结构。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叙述网络上，活跃着跋涉万水千山的唐僧师徒、啸聚山林替天行道的英雄豪杰、嬉戏于大观园中的贵族青年男女等各色人物。在浦安迪眼中，尽管他们的结局大多并不美好，但并不给人“末世般的终结感”，因为对这些人物的繁复摹仿和详尽讲述本身就表明，他们的故事值得讲述、他们的生活经验值得借鉴，这是“对经验世界基本肯定的看法”。而且，读者从这些小说中也不难感到，个人的悲欢离合、胜败荣辱不过是宇宙或自然律动的一个小小节拍，生活无论如何仍将继续。这些小说建构在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基础上，既承认“被讲述出来的经验有着某种积极的存在”，又认同“整体的道德秩序便由此混乱中诞生”。这也体现出浦安迪从存在论和伦理学角度对中国古代小说价值的肯定。

为中国古代小说在世界小说史上争取一席之地

小说是当今世界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就文化价值、社会影响、读者接受面而论，远超诗歌、戏剧、散文等文类，但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是一种“孤儿文体”，很难远溯到古代世界文学。作为欧洲文学的源头之一，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在史诗、戏剧尤其是悲剧、个人抒情诗等方面成就辉煌。中国自古就是诗的国度，虽然《诗经》、《楚辞》、汉魏六朝乐府诗歌、唐宋词等琳琅满目，《左传》《史记》等史传文学叙事艺术极高，但它们都不能简单等同于小说。因此，小说的起源就成为中外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难题之一。

浦安迪借用“小说的兴起”这一当代欧美小说研究的通行概念，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等论著中对中

“小说的兴起”作出具体阐释。他认为，时称“才子书”“奇书”的《金瓶梅》《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长篇小说均为典型的文人书案之作。虽然它们与民间故事和说书传统有一定联系，但都经过专业作家的精心打造，孕育于明代中后叶“自我意识浓厚的文化活动”之中。当时社会、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新变化：党派（复社、东林党）纷争、东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印刷业的发展、以修身养性为核心的新儒学的盛行等。这些动荡变化必然体现在文学创作中，“直接促成并有助于说明小说文体的成熟过程”。

这一结论的学术冲击力在于，浦安迪将“中国小说的兴起”定格在1500—1600年的百年变局中，而欧洲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堂吉珂德》（上下两卷）出版于1605—1615年间，英语世界的第一部现代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于1719年才问世，其中含有将中国小说与欧洲小说比肩而立的意思。换言之，现代小说的起源实际上呈现出“多中心”态势，中西小说相互补充，共同缔造了现代小说创作的基本范式。中国小说并非舶来品而是本土产物，在世界小说的发展演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上可见，浦安迪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诸多观点，无疑为西方客观认识和评价中国古代小说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作为一名汉学家，浦安迪在打破世界小说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塑造中国古代小说的正面形象、促进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进而促进中西文化相互理解和交流方面作出了有益贡献。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



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髓，为创新奠定基础、昭示方向。以传承为基，以创新为本，精神文明建设才能保持连续性并不断提升。三是在理念性与践行性相协调中把握发展规律。精神文明建设建什么、怎么建，必须有理论指引和规划部署。理念认识很重要，实践落实更重要。只有把理念性与践行性操作统一协调起来，才能够收到事半功倍、切实有效的成果。四是在现实性与理想性相呼应中把握发展规律。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扎根当下、立足眼前，保持自身目标任务的稳定性，其次要葆有与时代任务、深耕未来的发展追求，朝向理想的境界去奋斗。五是在民族性与开放性相促进中把握发展规律。中国文化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是关起门来进行的，需要相互借鉴与交流，保持对其他文化、其他文明的开放姿态。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扎根生于斯、长于斯的华夏土地，同时又应当秉持开放包容精神，不拒斥有助于自身成长的外来因素，坚持在交流互鉴中促进全球文化共同发展、世界文明共同进步。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推进伟大事业。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以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力量，需要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需要我们把握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规律，积极投身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之中，贯通推进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在继续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同时，创造出文化的新境界和文明的新高度。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史的底色

□ 李立华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各种文明不是独立存在的孤岛，它们的发展也非单体的线性前进，而是多元并存互动交融的协同演进。

在各种文明发展较为独立的上古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已经存在。上古时期的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印第安文明等，多属不同的地理单元，但当时不易打破的地理隔绝并未阻碍文明之间的交流。作为西方文明开端的希腊文明，在上古时期便与东方文明之间多有交往。希腊克里特宫殿里出现的真人大小的人体雕塑，其技法取自埃及新王国时期的艺术传统。希腊人在西亚地区腓尼基字母基础上添加元音而形成的希腊字母，创造了伟大的哲学与戏剧，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化。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华文明，在这个时期也早已开始了跨区域对外交流。西汉张骞的“凿空”之行，带回了西域的物产与地理及社会信息，标志着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西域系统化交往的开始。公元97年东汉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最远抵波斯湾，贯通了欧亚陆路交通。

在交流途径与内容趋于多样的中古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深度大幅提升。这一时期欧洲文明的发展在大规模借用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概念、法律体系的同时，融合了同时期东方文明的一些思想、宗教与技术等元素。古典文明的理性思考，对中世纪欧洲的神学与经院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鲁菲努斯、依格西奥等教会法学家在对罗马法的考证与厘清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共识，发展了自然权利的观念。而源出古代中东的基督教，以统一的一种信仰，影响了欧洲人的身份意识与精神归属。发端于游牧地带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扩张中接触到了印度、中国等古老的农耕文明，并受其影响部分农耕化。斯拉夫文明所在的地区，曾为古希腊罗马之边疆旧地，其与同时代拜占庭帝国的商业、政治与思想文化交流，加速了自身的文明发展进程。拜占庭东正教对斯拉夫人的影响便是明证。基辅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是仿照君士坦丁堡的同名教堂而建，并采用了拜占庭式的穹顶与马赛克镶嵌画风格。

这一时期，中华文明在融合中快速发展。隋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宋元至明初，海上丝路取代陆路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主要途径。以中国为起点、带有鲜明和平特征的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成为连接亚洲、欧洲、非洲的重要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并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融合与发展。通过丝绸之路等交通途径，在15世纪之前总体上遥遥领先的中华文明，为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除了四大发明之外，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还列举了中华文明影响西方的其他上百种发明，比如机械钟、铸铁法、马镫、卡丹轮、帕斯卡三角形、弓形拱桥、定量制图法等。

近代以来，世界连接成为一个整体，文明之间互动空前加强，交流互鉴的特征更为明显。15世纪末开启的地理大发现带来海道大通，使世界由相对隔绝的空间走向整体，各大大陆间联系的空前加强，促进了思想、技术、物种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交流与传播。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坚船利炮和殖民掠夺中强势崛起，给亚非拉地区人民带来了沉痛的灾难。后者在反帝反殖民运动中改革图存求解放，开始学习西方文明。以中国为例，19世纪以来，有识之士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等，先后从器物、制度与思想层面向西方学习。经过多次艰辛探索，最终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将发端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新的革命

道路，造就了如今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在这个文明交流空前频繁和广泛的过程中，西方国家也从其他文明吸收有益养分来实现自我发展。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思想对伏尔泰、莱布尼茨等欧洲思想家及其倡导的启蒙运动有深刻的影响。而在中国古代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也对英国等西欧国家官制度的建立产生了积极作用。总的来说，近代以来东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等文明交往现象，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制度思想、经济文化与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全方位交融与革新。

在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人类生活在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个客观现状更加需要我们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在交流互鉴中共同进步。

需要注意的是，文明的交流互鉴，并不意味着消除各文明的本性。如中华文明经历几千年时代变迁而延续至今，虽与外部文明不断融合与发展，但基本特征始终不变，并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借鉴和精神动力。实际上，正是因为文明各有特色，交流互鉴才成为必要。只有在多姿多彩、各美其美的世界中，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才会为文明带来新的发展。

“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秉承文明冲突论而建立以某一文明为中心的企图，终究无法撼动交流互鉴带来的世界文明多样性这一必然趋势。因为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已经充分表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鲜明底色，也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

